

武汉**文史**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103期 2001.5



李汉江 赵师梅与辛亥革命

本刊记者 首义之花香飘万里

——访武汉市政协秘书长肖志钢

宋仕钦

陈再道将军重游木兰山记

宋海东

胡昌民

听周小燕先生讲那过去的事情

刘作忠

蔡锷身后哀荣（上）

邓正兵

李济深与新桂系

ISSN 1004-1737



05 >

9 771004 173007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5期

总第103期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征文

□4 赵师梅与辛亥革命

李汉江

政协之窗

□6 首义之花香飘万里

——访武汉市政协秘书长肖志钢

徐双明

人物春秋

□11 陈再道将军重游木兰山记

宋仕钦 宋海东

□14 伍修权的革命历程

何锦洲

往事漫忆

□16 听周小燕先生讲那过去的事情

胡昌民

委员风采

□18 爱心·诚心·忠心

——记致公党成员戴淑琦教授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徐双明

责 任 编 辑:李 炜



难忘岁月

□19 新安旅行团在武汉

周洪宇

史海钩沉

□25 蔡锷身后哀荣(上)

刘作忠

□31 李济深与新桂系

邓正兵

历史档案

□36 武汉市硚口区司法改革运动始末

汪明敏 孟丽芳

戏剧舞台

□40 京剧“厉家班”到汉口演出的前前后后

陈宛茵

人物传记

□44 陈诚其人(连载三)

汪烈九



封面图片:彭刘杨三烈士墓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 - 1737

CN42 - 1056/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 老 照 片 ·



辛亥十老忆辛亥座谈会留影（1981年9月）

戴炳山、袁学彬、傅希奕、刘心田、喻育之
赵师梅、龚松珊、万业才、周时祥、范志鹏（从左至右）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5期

总第 103 期

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征文

□4 赵师梅与辛亥革命

李汉江

政协之窗

□6 首义之花香飘万里

——访武汉市政协秘书长肖志钢

徐双明

人物春秋

□11 陈再道将军重游木兰山记

宋仕钦 宋海东

□14 伍修权的革命历程

何锦洲

往事漫忆

□16 听周小燕先生讲那过去的事情

胡昌民

委员风采

□18 爱心·诚心·忠心

——记致公党成员戴淑琦教授

主 编: 周志华

副 主 编: 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 徐双明

责 任 编 辑: 李 炜



难忘岁月

□19 新安旅行团在武汉

周洪宇

史海钩沉

□25 蔡锷身后哀荣(上)

刘作忠

□31 李济深与新桂系

邓正兵

历史档案

□36 武汉市硚口区司法改革运动始末

汪明敏 孟丽芳

戏剧舞台

□40 京剧“厉家班”到汉口演出的前前后后

陈宛茵

人物传记

□44 陈诚其人(连载三)

汪烈九



封面图片:彭刘杨三烈士墓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 - 1737

CN42 - 1056/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赵师梅

与



湖北军政府大门(大门上方悬挂的是十八星旗)

辛亥革命

□ 李汉江

已故辛亥革命老人、武汉工学院教授(系主任),我尊敬的老师赵师梅,早年加入共进会,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并在武昌首义之役中戮力效命,立下功勋。

1894年10月23日,在鄂西山区巴东县楠木园山坡上韦家荒一栋土墙庄屋里,伴随清脆的啼哭声,一个男孩降生人间。他,

就是辛亥革命首义时高高飘扬的义旗——十八星旗的制作者赵学魁(后改名赵师梅)。

韦家荒,本是太平天国时由韦家迁来此地开垦出来的。1870年后,韦家家道中落。斯时,楠木园镇上经营百货的赵学魁的祖父生意颇为兴隆,且人丁兴旺,遂从韦家买下这所一排八间的庄屋及周围一大片可耕地。赵学魁昆仲11人,姊妹9人,他排行

第三。1902年,赵学魁之父在省城武昌考中秀才。不久,清朝明令废除科举,兴办西学,楠木园成立乡小,其父被县衙命为教员,赵学魁也由旧学转为西学。1909年春,他考入县华林武昌中等工业学堂,录为该校电机第一班学生。其时,巴东人在省城者甚少。在这里求学、经商或当兵的总共不过十来人。常言道:“亲不亲故乡人”,因而他们彼此亲



善,情同手足。尤其是两个当新军的巴东人邓玉麟、高尚志,每逢星期天,风雨无阻,必进城到赵学魁宿舍聚餐。同时,他们还时常带些《黄帝魂》、《烧饼歌》等小册子给赵学魁阅读,从而激起赵学魁满腔热忱,由痛恨丧权辱国之媚外条约,渐而切齿痛恨腐败的清王朝,认为“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族将不族矣”,颇有灭此鞑虏然后朝食之气概。后来赵学魁知道邓、高是孙中山领导的“共进会”(同盟会分支)会员。未几,经他俩介绍,赵学魁也正式成为共进会会员。

1910年春,邓玉麟去巡道岭(今武昌粮道街)租房屋一栋,挂牌“同兴学社”,赵学魁偕弟随之迁入居住,一边读书,一边担任革命联络事务。按约,每月头一个星期日,共进会会员、南湖炮队总头目孟发臣都要来此向邓反映炮队情况并了解国内革命形势。

1911年仲夏,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共进会负责人刘公(字仲文,襄阳人)捐款3000元,作为首义前革命活动的经费。一星期天,刘公在武昌正卫街刘家公馆大会客厅内召集赵学魁兄弟和陈磊(陈潭秋之弟)说:“现在民众革命热情高涨,正是举事的大好时机。”边说边用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屉,神秘地拿出一张纸质的“十八星旗”图样,要求他们绘制二十面义旗。刘公指着图样解释说:“红底黑九轮表示铁血精神,决心推翻清王朝;黑九轮上下的18颗小黄圆星代表18省人民,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之意。”赵学魁接受任务,当即买来红布,画成底稿,因需要量大,

刘公又派杂役代买了笔、墨和一方大砚盘,并从刘天宝药铺买来了藤黄。他们三人有的磨墨,有的铺开剪好的方形红布,赵学魁则用墨水在应是黑色的地方涂上墨,在应着黄色的地方涂上藤黄。他们每天下午齐集到刘公馆描画义旗,所绘制的二十面旗帜,由邓玉麟找草湖门(今积玉桥)一位裁缝师傅乘夜半之机秘密缝制。因事关重大,深恐泄漏机密,每次皆由邓送两面去缝,缝好取回后再送两面。先期缝好的十八面旗分别保管在汉口孙武处和刘公馆。

是年10月8日,革命党人在汉口宝善里俄租界制作炸弹时失慎爆炸,暴露目标。俄籍巡捕迅即查封现场,并将革命党人的名单及存放的十八星旗全部抄去,送至武昌总督府。清廷对此惊骇不已,立即下令去武汉三镇大肆搜捕。翌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部集会时,军警破门而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蒋义武、蒋翊武等40余人遭捕。由于“共进会”、“文学社”总部均被查抄,情况万分危急,革命党人决定当晚12时举事,以便救出被捕同志。联络员赵学魁急忙奔走于各军营传达通令,后因准备不及,未能如期举事。

10月10日晨,赵学魁打开住所大门,只见过往人群左顾右盼,诚惶诚恐。一打听,方知全城城门紧闭,又传闻总督府门前电杆上挂着三个血淋淋的人头。赵学魁受命去新军二十九标找高尚志了解情况。高说:“三个烈士乃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你赶快去南湖炮队告知邓玉麟和孟

发臣,今晚12时无论如何必须起事。”赵学魁马上抄近路赶往南湖炮队送信,下午3时,刚返回“同兴学社”机关,就被警察逮捕,双手反绑,押至巡道岭警所,恰与堂弟赵学诗关在一处。兄弟俩奔走大半日,早已唇干舌燥,饥肠辘辘,但不愿让警察看出疲惫模样,乃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对弈到天黑。由于疲劳已极,两人不知不觉倚墙睡着了。睡梦中猛然被房东太太叫醒:“小兄弟,山前炮响多时,警察都逃走了,你们回去吧!”兄弟俩惊起跑出,随队参加围攻总督府的战斗。夜3时,卫队营全部被革命党人肃清,但总督未能捉拿归案,据说他闻风躲到停泊在长江的外国兵舰上去了。

10日晚,邓玉麟临时取回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旗挂在司门口南楼阁楼上。次日早晨,赵学魁见到自己亲手绘制的十八星旗在晨风中高高飘扬,顿时热血沸腾,他感慨万千地对赵学诗说:“只要这面义旗能够飘扬一日,纵身首异处亦所甘也!”

10月中旬,孙中山令黄兴抵汉,在汉阳成立总司令部。赵学魁在战斗中受枪伤,因军功卓著,被授予特等功勋,由军务司指派,与李西屏(字翊东)同为司令部军需官。孙中山在南京成立总统府之后,急令黄兴回南京就任新职,赵学魁亦随同调用。



首义之花香飘万里

——访武汉市政协秘书长肖志钢

本刊记者 徐双明

记者：今年是武昌首义 90 周年，武汉市准备组织系列纪念活动，我们大家对此都非常关注。在年初召开的政协全会上，许多委员为“打好首义这张牌”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同时，创建“首义文化区”被列为全会的建议案，可是，据我们所知，早在 1991 年，也就是辛亥首义 80 周年的时候，您当时任武昌区区长，首先提出了“首义文化”的新概念，并把“武昌辛亥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搞得如火如荼，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武昌区的知名度，您又率先提出“创建武昌首义文化区”的建议，并在新闻媒体上发表多篇文章，寻求支持。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肖志钢：在准备隆重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之际，我们根据武昌是首义之区的独特优势，提出了武昌辛亥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总体设想，抓住机遇，大胆起步，于当年 10 月 8 日至 11 日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举办了武昌辛亥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这次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按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武昌搭台，各地唱戏。”的方针，主要开展了文化演展、商品交易、物资交流、科技成果展示、开发引进项目洽谈、百名中医专家咨询门诊等六大系列活动。省、市、区的领导，全国 24 个省市区的 100 多个政府和企事业代表团，海外来宾、各界知名人士代表 4000 多人到会，其中港澳台胞及外宾 50 多人。这次文化活动场面壮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经贸活动领



肖志钢在“武昌辛亥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上讲话

这么大这么好的活动。市委领导说，武昌的这次活动为武汉市争了光。应邀前来参加辛亥首义文化节的香港实业家黄先生更感惊奇，他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规模，内容这么丰富，气氛这么热烈，比我想象的隆重多了，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广大市民普遍反映，在武昌区举办这样的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规模，都是空前的。

第二，一举多得，成效显著。这次活动，

域宽广，成效显著，总成交额达1.78亿元。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影响很大的盛会，取得了超出预计的成效。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快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推动城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探索了新的途径，积累了经验。

记者：武昌辛亥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取得了哪些成果？

肖志钢：第一，规模空前，影响很大。参加这次文化经贸活动的有中顾委委员韩宁夫、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得利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林少南，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顾委、市政协领导郑云飞、李岩、刘善璧、乐东汉、王杰、黎智、高顺龄、王哲南、王功安、伍能光、王光远、李泊等同志。市政府副市长高顺龄在开幕式上致词祝贺。直接参与文化系列活动和经贸洽谈的达3万多人，观众达10多万人。这次活动把文

化与经贸结合在一起，不仅形式新，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文化活动有370多个单位4000多人参与，开展了“首义风云”彩车展演、民间艺术表演、文艺晚会、联欢会、书画艺术展、名人字画表演、文化赶集、棋类大师表演、歌手邀演赛等14大类系列活动。参加商品、物资、科技、项目洽谈、一条街展销的有24个省市区100多个代表团，区内外1000多家工商企业的代表，进行了几十个大大类数万品种的的商品、物资、科技成果交易。有100名中医专家开展了29个专科门诊咨询，6000多人就诊。中央和省市地方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对文化经贸活动作了近100篇（次）报道，这一系列的文化经贸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些亲眼观看了文化节开幕式壮观场景的外地代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区举办的。省里领导感慨地说，没想到武昌区能搞

既注重了声势上的轰轰烈烈，更注重了效果上的扎扎实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对全区进行了一场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过去不少人对辛亥革命及武昌首义不了解或不够了解。通过这次首义风云、辛亥革命三烈士、首义第一枪、炮轰总督府等八台大型彩车展演、文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宣传了辛亥革命与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及其现实意义，使不少人了解了历史，收到了好的成效，弘扬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是宣传了武昌，提高了武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全国各地的代表到武昌参加文化经贸活动，看到了武昌的文化、科技、经贸及地理环境等优势，增强了与武昌开展多方面的经济文化合作的愿望，国际上的一些朋友通过新闻媒介，也加深了对武昌的认识。不少代表说，过去我们对武昌了解不多，



通过这次活动,看到了武昌的实力,武昌的市场,今后要多与武昌做生意。三是弘扬了民族文化,展示了武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次文化活动,以反映辛亥革命文化为主,把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不仅主题鲜明,而且形式新颖。八台大型彩车设计高超,寓意深刻。知名演员、书法家、中医专家出场献艺,广大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了各种富有楚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精湛的文化艺术展演,反映出了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外地来宾的赞赏。四是经济成效喜人。这次经贸洽谈会,总成交额达 1.78 亿元,一批地产品直接零售形势较好。大会期间,各地代表介绍了一批经协项目,签订了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36 个,总金额 270 多万元,预计效益 1300 多万元。武昌激光设备厂与外地三个单位签订了联合生产协议。展出科技成果 620 多项,中医科研成果 60 多项,签订了科技成果合同和意向书 30 多个,其中有 6 项签订了正式合同,预计投产效益 2000 多万元。总的情况看,销出比购进多,区内比外地多,现货比期货多,地产品销售比平时多。五是扩大了武昌的对外开放。通过文化经贸活动以及新闻报道、宣传画册等宣传,推动了文化名城的对外开放力度,不少的外地客人表示要与武昌合作,开展更为广泛的经贸活动。六是整个活动进展顺利,没出任何事故和差错,各地代表十分满意。各种会议交易活动交叉进行,由于投入了 300 多警力,有效地维持了秩序,不仅大规模开幕式没有发生伤

亡事故和治安问题,而且各种分散的文化经济活动也没发生一起事故。全部活动善始善终,服务周到,对外地客人做到了“四不”要求:接待不漏人,服务不漏项,返程不漏票,送客不误点。外地代表说,我们参加了不少交易会,但组织得这么好,服务这么周到的确实少见,武昌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七是这次活动的成功,为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和今后的重大活动积累了经验。这次活动是实施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战略的第一步,它的成功证明了首义文化经济开发是符合武昌实际的,是可行的,文化与经济是可以结合达到相互促进的,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利用自身的优势,推进城区两个文明探索了新途径,积累了新经验。

记者:您认为成功的关键在哪里?

肖志钢: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是我们武昌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自己设计,自己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活动。作为一个城区,在前无经验,财力困难,有些条件受到制约的情况下,能否成功地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我们开始也曾有过担心,但我们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依靠武昌区广大单位的共同努力,使这次活动成功了。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勇于创新,正确决策,是成功举办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的前提。那些年,我们在建设武昌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提出了首义文化

经济综合开发的构想。当年年初,我们根据构想,提出了以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为契机,举办首义文化节和经贸洽谈会。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亲自出面,先后召开四次研讨会、座谈会,听取意见,探索总体构想和这次活动的可行性。我们的这一构想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重视,得到了人大、政协以及各界人士和理论界专家学者的支持。区委、区政府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抓住辛亥革命 80 周年的契机,大胆起步,并把这次活动作为全区本年度下半年的一件大事来抓,为这次活动的成功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领导重视,各方支持,是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成功的关键。这次活动的成功,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无私援助,紧密配合。这次活动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省政协主席沈因洛早在当年元月份就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个好建议,也是一件大活动,并要求各方配合进行。当年 10 月份,市委副书记李岩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后又在专题研讨会上指出“首义文化经济综合开发是在历史研究与现实运用结合上的突破,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重要形式。”省市有关部门积极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省市领导的肯定,坚定了我们信心。文化节开幕式上,省市领导到会并表示祝贺,提高了活动的规格和影响。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纪委几大家的领导,始终关注这项活动,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会进行了专题研究,人代会期间也进行了



专门的讨论,政协、统战部的领导多次组织党外各界人士讨论咨询,积极开展三胞三属的联系和邀请工作。在活动期间,区五大家领导分头坐镇指挥,保证了全部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保证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市、区公安局长亲自担负安全保卫的指挥工作。这次活动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得到本区 400 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区各单位出人、出钱、出车、出节目、出主意,给予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的支持。这次活动中武锅、武船、武重、武车、7435 工厂、电

视机厂、34660 部队、市汽运五公司、黄鹤大厦、区工商局、武昌商场等 10 个单位为大会制作了八台大型彩车。有 60 多个单位抽调了车辆和人员,有 300 多个单位编排了文艺节目。铁路、港务、民航的同志上门服务,千方百计保证了来汉客人的返程车船机票。新闻宣传、理论界的同志们给予了积极配合,记者不辞辛苦,仅文化节专题报道的文字、图片、广播、电视宣传就有近 100 篇(次)。一些知名的中医专家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专科咨询门诊。

第三,深入发动,精心组织,是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成功的保证。在时间紧、任务重、规



肖志钢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门前

模大、涉及面广的情况下,我们把能否成功地举办好这次活动,作为党和政府的组织号召能力,部门的协调配合能力,市民群众参与意识的一次大检阅。区直各部门、各单位,为了搭好台,让企业唱好戏,保证活动的圆满成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做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工作。根据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的总体方案,六大项活动的筹办单位均制定了实施方案,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发动,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各分会都组织了专班集中办公,并分阶段检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在各项活动正式进行的过程中,广大干部职工不分昼夜地工作,把工作落实到各个细小的

环节上。文化局的同志在人员少,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全局干部职工连续几天几夜加班加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派出 30 多名干警负责开幕式的交通安全。城建战线各部门和干部职工在“三烈士”塑像建造、会场搭台、绿化装饰、市容卫生、道路维修等方面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全区 14 条街道的领导直接参与组织,不仅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还组织了各具特色的文艺展演节目,增加了节日气氛。整个活动的宣传报道及时、全面,扩大了活动的效果。还有不少部门不计名利,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这次活动,几乎所

有部门和单位都投入了人力物力。不少部门和单位还主动为区里分担实际困难。通过这次活动锻炼了队伍,检阅了我们的组织能力,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积极的参与意识。

第四,“三搭台,三唱戏”,是首义文化节暨经贸洽谈会成功的有效途径。这次活动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武昌搭台,各地唱戏”的方针。我们利用辛亥首义的特殊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引力,在活动的安排上做到时间与空间结合,把文化活动与经贸活动交织在一起。在文化活动中渗入经济活动,在经贸活动中注入文化活



动。全部活动由政府出面组织,参加活动收得效益的是广大工商企业。武昌承办的这次活动,不仅为武昌的工商企业经贸组织交流提供了机会,也为100多个外地的经贸代表团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场所。实践证明,这是文贸联姻,相互促进,政府为企业服务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次活动,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但由于我们在组织这样大的活动上缺乏经验,因而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反映在我们对首义文化节的舆论宣传不够广泛,缺乏超前性;经贸活动中引进外资项目还是薄弱环节;文化活动比较分散,开幕式文艺节目有些重复;受条件限制,活动场所几次易地,使得筹备工作太紧张并出现局部忙乱现象。

隆重、热烈的大规模活动结束了,但它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经济成果并与四方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给我们留下了宽阔的回味空间。

· 记者:您认为这次活动能给我们哪些有益的启示?

肖志钢:启示之一,只要认清和利用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经贸活动,就能收到良好的成效。这次活动成功的主要前提是我们抓住了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独特地位,以及辛亥首义文化在海内外具有较强政治引力、文化引力、经济引力,这样一种独特的优势,把首义文化活动与经贸活动融汇在一起,同时又抓住了辛亥革

命80周年这个机会。因此独特的优势与良好的机遇,使文化经贸活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既具有政治文化意义,又有经济意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形成了“历史的回音”与“未来呼唤”的交融,无论是文化活动,还是经贸活动,都取得了比预计还好的成效。

启示之二,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文化与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次活动,我们把文化系列活动既作为自身繁荣发展的需要,又把它作为经贸活动的载体,以文化活动推动经贸活动,以经贸活动促进文化活动,体现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原则,既弘扬了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又服务了现代经济建设。

启示之三,繁荣文化,搞活经济,潜力很大,关键在于恰当的组织 and 发掘。这次文化经贸活动中,全区涌现出那么多的单位支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这说明潜力很大,各方的参与意识很强。这一方面是活动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许多单位都有一种通过活动表现自身实力,借助活动实现自我的愿望,因此,可以说繁荣文化,搞活经济,在这个既有文化特色,又有雄厚工业基础的武昌,是很有潜力的。只要我们以全地区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采取各方面都愿参加并能得到利益的恰当方法,搞好组织与服务,去搭好这个舞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都会唱出更多更为精彩的戏来。

启示之四,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各方面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有自身特色的“好文章”。

直接或间接参与这次活动的既有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职工,又有非直接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既有党政领导和机关干部,又有各群团组织和市民群众,大家虽然本职工作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繁荣文化出力。不少单位不仅积极完成交办的任务,还主动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为文化经贸活动作了许多服务工作。实践证明,为经济工作服务,不直接从事经济工作的部门和同志,不是使不上劲,而是大有作为,只要思想上树立中心意识,行动上主动积极参与,就能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陈再道将军于木兰山金顶留影



陈再道将军重游木兰山记

□ 宋仕钦 宋海东

1986年5月8日下午4时许，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再道上将在中共湖北省顾委副主任沈因洛、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他浴血奋战过的地方——黄陂木兰山。

木兰山地处武汉市北郊，方圆约30平方公里，相传为替父从军的木兰将军的故里。自唐至清，随着宗教活动的日益兴旺，山上先后修筑了七宫八观三十六殿。庙宇的建设均依山傍崖，麻石干砌，设计奇特，建筑宏伟。每年农历八月的木兰庙会期间，往往能吸引来自省内外数以十万计的善男信女，是我国道教、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进入80年代，该山又被辟为武汉市郊避暑、风景游览区，“文革”期间被毁的古建筑逐步得到恢复，古老的木兰山重新焕发生机。

我当年有幸在木兰山风景区管理处负责接待工作。当日晚餐过后，我将一批山史资料 and 一枚

游山纪念章送到了陈老下榻的东泉庵宾馆101套间。这位老人当即便接过资料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这套打印过的资料足有一寸多厚，内容包括木兰山的历史沿革、风景名胜、故事传说、民俗文化等等。陈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身材不算十分高大，略显发福，但举手投足间仍可见当年叱咤疆场的身影。

次日，陈老早早地起了床。8时整，他乘车抵达木兰中心广场。这一天风和日丽，山上最高气温在29℃左右，大多数人都只穿着衬衣，陈老却依然身着一套深蓝色中山装，头上是一顶太阳帽式样的小斗笠，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宽框眼镜，脚下为白色旅游鞋，手持拐杖一柄，左侧胸前还佩戴着我前一天送去的那枚游山纪念章。

登山之前，一行人先来到了广场边的接待室。接待室也是木兰山革命历史陈列室，墙壁上悬挂着李先念、胡耀邦、徐向前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同时也有陈老在1984年12月20日的亲笔题词：“木兰精神，万古长存！”

坐在接待室里，大家边品尝木兰香茶，边倾听陈老追叙自己1928年在黄麻起义失败后随鄂东军转移到木兰山的战斗经历。他说：“那一年12月下旬，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鄂东军负责人在黄安（今红安）的闵家祠堂里集合，包括我在内的72名同志，携带着53支长短枪，走上了通往木兰山的革命之路。一路上大家都牢记着吴光浩临行前交代的话：‘只要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木兰山在等待着我们！’29日，我们终于来到了木兰山脚下。经过长途跋涉的同志们兴奋了一阵，倒在地上便打起了呼噜。我尽管也很疲劳，但毕竟才19岁，初次见到这座被我们麻城的乡亲们视作圣地的木兰山，未免十分激动。抬头望去，整座大山都被寒天冷雾缠绕着，只有山头的金顶上映出片片金光，真像仙景一样……”

考虑到陈再道将军是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副滑竿，他却拒绝乘坐，“你们莫小看我，身体还扎实着呢！陈再道今天要自立更生，‘再’走木兰‘道’！”说着便率先从南天门拾级而上。

陈老此举并非逞强，持杖跨过数百级石阶到达雷祖殿后，他气不长喘，依然谈笑风生，告诉我们当年鄂东军指挥部就是在这座殿内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将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任命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下设3个分队，

他也因此从一个农民自卫军战士成为正规红军的一名班长。“我就是在这里办的‘转正’手续。”陈老的麻城话引起满殿笑声。

据陈老介绍，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五人组成第七军党委，作为全军的领导核心，并强调必须把工农革命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大问题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坚决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次会议为第七军乃至红四方面军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

沿途的殿观庙宇除了雷祖殿，还有十多座。陈老每每进入，便会主动与僧道们拉拉家常，问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根据资料记载，20年代木兰山上有100多位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他们当中许多人从超脱凡尘的宗教观念出发，最初总是向第七军将士投以冷漠的目光，认为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无非是干些杀生害命的事情，属于大逆不道之徒。吴光浩为消除他们的误解，利用自己是当地人的有利条件，操着一口黄陂话反复向他们宣传工农武装与反动军队之间的区别，再三声明自己的部下纪律严明，决不干扰僧道们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全体干部战士要尊重出家人，爱护山上的一草一木，以实际行动赢得僧道两教的信任。全军同志均牢记吴光浩的命令，进驻后未经主人允许不进佛殿、道观，不打搅僧道，并经常帮助僧道打扫卫生，劈柴挑水，维修道路和庙宇。不几天，上至方丈、道长，下至伙头、杂丁，都

向第七军官兵报以微笑，此前的畏惧、担忧、戒备心理渐渐消除。一些出身贫苦人家的下层僧侣甚至主动与红军们来往，把粮食、蔬菜送到部队的伙房，诚恳地表白：“这是大家用力气种的，队伍只管用，不碍事。”年轻的陈再道当年还与仁忠寺内的一位小和尚成为要好的朋友。木兰宗教界的高层人士也向第七军伸出友好之手，其中一位名叫万昭虚的道长为部队上下提供了许多方便。有时候敌人突然上山“围剿”，干部战士们来不及转移，万道长就将他们请入道观内穿上道袍，临时充当一回道士。

半个小时后，一行人终于登上木兰东峰之巅。站在金顶上，陈老指着脚下刚走过的山道思索着说：“我在武汉军区当司令员时，也回过一趟木兰山，那时候这段路两边都有铁链护栏。一晃20年过去了，闹了场‘文革’，铁链再也没法见到，只剩下石道还在。”随即，老将军又把目光投向薄雾笼罩着的东南方。“再过去十来里路的山脚下，就是罗家岗。”他兴奋地用手杖指点着，“1928年大年夜，吴光浩军长带领包括我在内的20多个同志开赴那里攻打大恶霸地主罗胜元、罗安元的庄院。除夕夜里，按照你们这里的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出行’，也就是打开大门，走到屋外放鞭，求菩萨，请财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两旺。我们原本想利用‘出行’的机会突袭罗家大院，没想到这两个家伙察觉到风声，夜里庄院的大铁门迟迟不见打开，我们隐蔽在大门附近，身上落满了雪花，冻得直哆嗦。直到鸡叫头遍，我



们突然发现罗家炮楼上闪了几点亮光,接着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原来,他们是在炮楼上求菩萨,请财神。同志们急了,冲着炮楼开了枪,敌人也很快还击起来。罗家大院坚固得很,炮楼居高临下,正月初一打了一天,也没法攻开。正着急,一位同志发现紧靠着外面的院墙有座榨油房,里里堆满油渣饼。‘点着油房,用火攻’大家嚷着找来火把,不大一会,榨油房变成了火海,火舌顺着风向,呼呼扑向院内。罗家主仆一阵鬼哭狼嚎后,打开了院门。这次战斗,我军没一人挂花,缴获长枪19支,还搜出不少大洋和粮食。我们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又打开罗家办的当铺,无偿归还给原主。一时间,方圆几十里的穷人纷纷挑着箩筐,拿着布袋拥向罗家岗,罗家庄院的院里院外都挤满了穿破衣、戴旧帽的人群。乡亲们笑得合不拢嘴,都说这一仗打得是时候,罗家不开门‘出行’请财神,反倒招来一群‘火神’,烧了个净光。可以说,这是黄麻起义失败后我们打的第一场漂亮仗,第七军因此士气大振。”

走下金顶,一行人抵达了位于木兰西峰和木兰东峰间的一道山沟。陈老接受我们的建议,在此留影多张。我突然产生出一个念头,渴望能够有与陈老合影的荣幸!细心的首长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伸出大手招呼我和另一位担任导游的同志说:“来来,我们几个老黄冈人拍一张!”

我知道,陈老之所以称我们是老黄冈人,指的是1937年至1938年,黄陂与麻城曾经一同隶属于黄冈管区。而且在1942年,

受日寇侵略所迫,黄陂县治一度迁移到麻城张店。

我激动地走到陈老身旁,拍下了这张难忘的照片。

玉皇阁旁侧还有一条通往后山的小道,征求过陈老的意见后,大家决定从这里下山。途中,陈老又讲起了当年在木兰山遇险的故事。

那是部队上山一个月后,有一天大家正在观音沟驻地休息,突然传来紧急命令,称国民党军队魏益三部正向木兰山进逼,我军必须迅速转移。临出发前,吴光浩把一个装有500块银元的袋子交给陈再道,让他负责送到新驻地。本来,第七军有一位战士专门负责背银元,但此人经受不了战火考验,思想上产生动摇,当了逃兵。

部队刚启程,敌人便追来了。陈再道背着银元与战友们一路急行军,翻过一道山梁,又越过一条山沟。渐渐地,他的步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迟缓,感觉身上像压了一座小山。毕竟,驮着500块银元翻山越岭不是件轻松的事,况且陈再道将军当年的身体非常单薄,终于他被大部队甩在了后面。

敌人与陈再道愈来愈近,狂妄的叫喊声可以清晰地听见。“站住,你跑不了啦!”“抓活的!”若要逃生,扔掉钱袋是唯一的办法。可这是部队的生活费啊,吃穿装备都得用它买,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怎么办呢?正在焦急之间,陈再道发现山下有个大池塘。脑筋灵活的他顿时有了主意,把钱袋解下来抱在怀里,冲到塘边假摔进水里,就势松开抱住钱袋的手。随后,他奋力游上

岸,飞快地冲入前面的一片密林。

这一切只是眨眼间的事。追敌眼瞧着几乎已经抓到手的“共匪”消失得无影无踪,懊恼无比,噼里啪啦冲着林子里胡乱放了一阵枪,快快而归。

夜里,赶上部队后的陈再道又带着几个战友返回池塘边,潜入水底打捞钱袋。正值寒冬,塘水冰冷刺骨。几经摸索,陈再道的手终于触到了钱袋,“捞到了!”

钱袋子迅速被同志拉扯到岸上。一股冷风袭来,大伙顿觉身上火辣辣的,抖个不停。然而看到钱袋子的扎口仍旧绑得紧紧的,几位小伙子心里都乐开了花。

之后,第七军仅留下了少数同志在木兰山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转移到木兰山东面的黄冈、罗田一带,3月初才重返木兰山。不久,第七军又缩编部队,组成3支手枪队奔赴麻城、孝感以及黄陂北部开展对敌斗争。

陈老一行最后抵达的地方是红军洞(又称风洞、黄石洞)。《辞海》“木兰”辞条对这座洞曾作介绍。据传该洞与30公里外的矿山的一座石洞相通,可见其幽深。陈老对此处的感情似乎格外深,在洞前留影多张。他还不顾湿滑阴暗,步入洞内近30米处,洞中潮气极大,与洞外有明显温差。在我们陪同人员的一再劝说下,陈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风洞,回忆道:“刚上山,我就接受命令进洞侦察一番,为的是寻找一处应付紧急情况的隐蔽场所。”并说:“木兰山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极具发展潜力。这



伍修权

的革命历程

□何锦洲

地方有三个特点是别的名山比不上的，一是道教、佛教共处一山却能够和睦相处；二是山峻、石奇、洞幽、花美；三是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摇篮，留下了观音沟、红军洞等革命旧址。尤其是这批革命旧址，你们要注意保护，并尽快开发出来，向广大游人开放，把木兰山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对陈老的嘱托，我们均谨记在心。两年后，便将整饰一新的红军洞敞开洞门，接待八方游客。后虽因山洞局部塌方关闭了一段时间，但当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后，又在90年代成为木兰山的一大游览点。此外，木兰山革命历史展览馆和木兰山革命纪念碑也纳入建设规划。

游罢山，已近中午12点。回东泉庵宾馆用罢午餐，陈老又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同样是下午4时，陈再道将军最后一次告别了木兰山。我注意到，陈老登车时的表情很严肃，似乎还带有一丝伤感。

如今，又过去了14年，陈再道上将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陪伴他重游木兰山的每一个瞬间我仍然历历在目——这已经成为我生命中值得特别珍藏的一段记忆。

伍修权，湖北武汉人，1908年3月生。青年时代，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1923年12月，经陈潭秋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学毕业后他到共进书社当店员。1924年，他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1925年，他在武汉参

加五卅运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同年9月，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与邓小平、蒋经国是同校同学，先后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俄语等课程。1927年5月13日，他曾聆听斯大林到校作《答复中山大学学生十个问题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1927年9月，他到苏联红军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时，他与红军战士参加红场阅兵典礼，在红旗的引导和军乐伴奏下，擎着步枪，迈开阔步，通过了红场的列宁墓前，接受斯大林等苏俄党政领导人的检阅。1929年10月，他到伯力，在苏联俄罗斯远东国家保卫局，任见习员，翻译中俄文文件，同走私犯作斗争，并在纪念该局成立十周年的文集上，发表了用俄文写的《中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全国革命的形势》一文。1930年12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保卫局任翻译。

1931年6月，伍修权回国，先到上海，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兼司令部直属机枪连教员，在福建上杭的芦丰作战中脸部受伤，到汀州医院治疗。同年冬，他在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军事教员，后任第四队队长、第四连指导员。1933年春，他任红一方面军模范团政委。5月，任红军第三师政委。6月，他任福建军区汀(州)连(成)军分区司令员。同年秋，他到瑞金红军学校，任步兵团(第五期团)政委，讲《中国革命问题》等政治课。10月，他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共产国际派